

# 吕留良时文评选中的遗民心态与朱子学思想

——以《四书讲义》为中心

张天杰

(杭州师范大学 国学院, 浙江 杭州 311121)

**摘要：**生于明清之际的吕留良，因其家庭出身而有着曲折的遗民心态，愈来愈坚守明遗民的节操，同时在思想上也愈来愈尊朱辟王而毫无假借。他的思想通过时文评选这一独特形式进行传播，后汇为《四书讲义》一书，他对朱子的阐发在义理层面是统一、精切、独到的，无论是对王阳明、陈亮学术的排斥，还是对夷夏之辨以及君臣、封建、井田的讨论，都是从节义之道引申而发展了朱子学。

**关键词：**吕留良；时文评选；《四书讲义》；清初朱子学；遗民心态

**作者简介：**张天杰(1975—)，男，浙江桐乡人，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、政治与社会学院副教授，主要从事浙学、明清思想文化研究。

**基金项目：**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尊朱辟王——清初由王返朱思潮研究”(项目编号：14BZX047)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四书学史”(项目编号：13&ZD060)的阶段性成果。

**中图分类号：**I206.4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1001-4403(2017)04-0146-10 **收稿日期：**2017-04-18

**DOI：**10.19563/j.cnki.sdzs.2017.04.018

吕留良(1629—1683)，字庄生，又名光轮，字用晦，号晚村，别号耻斋老人、南阳布衣；暮年为僧，名耐可，字不昧，号何求老人，浙江崇德县(康熙元年改名石门县，今属桐乡市崇福镇)人。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，同时又是著名的理学家、时文评选家、以刊行“程朱遗书”著称的出版家，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，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《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》(以下简称《四书讲义》)。

早在清初，就有人称吕留良思想主旨为“尊

朱辟王”，故而每每论及其学术思想，学者们大多强调其“尊朱辟王”的一面，这就很难解释，为什么在雍正朝深受吕留良影响、同样倡导“尊朱辟王”的陆陇其获得了清廷的推崇，而吕留良却沦为文字狱批判的对象？<sup>①</sup>于是学者们又转而表彰其“夷夏之防”的一面，或认为其君臣、封建、井田等思想极有价值，那么这些带有“启蒙”色彩的思想，与朱子学又是什么关系？学界尚未有专论将其“尊朱辟王”“夷夏之防”等问题相互之间的关系解释清楚。<sup>①</sup>事实上吕留良虽受朱熹影响极

<sup>①</sup>关于吕留良的研究，大多集中于文字狱案件，研究其思想最为全面的是钱穆，详见下文论及。此外较重要的还有：容肇祖《吕留良及其思想》，载《辅仁学志》1936年5卷1-2期；陈祖武《吕留良散论》，载《清史论丛》第7辑，中华书局1986年，此文修订之后，载于作者的专著《清初学术思辨录》第七章《吕留良与浙西学术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；[美]狄百瑞著、黄水婴译《儒家的困境》第四章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；[日]伊东贵之著、杨际开译《中国近世的思想典范》第五章，台湾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。另有多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吕留良《四书》评语。学界已有研究大多将“尊朱辟王”与“夷夏之辨”以及封建、井田论等孤立来看，又未联系其遗民情结、时代变迁，故得出的论断多有片面、不够圆融。

深,但年轻时对王阳明的心学也抱有极大的兴趣,当时推崇王学的浙东学者黄宗羲也在吕家处馆多年。吕留良后来之所以转而倡导尊朱辟王,改请推崇朱子学的张履祥来吕家处馆,还有他在《四书讲义》之中对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诠释,以及对君臣、封建等问题的看法,都与其曲折发展着的遗民心态有关。只有将此二者充分结合起来讨论,方才能够真正明晰其朱子学思想的真正实质,故有必要从明清易代这一时代背景与其遗民心态这个角度,来对其学术思想加以重新考察。

## 一

吕留良的本生祖吕燠,明嘉靖时为江西淮府仪宾、尚南城郡主,后为了侍养父母而与郡主一同回籍。本生父吕元学,万历二十八年(1600)举人,后谒选为繁昌知县,兴利除弊,有循吏之称。吕元学育有五子:大良、茂良、愿良、瞿良和留良。吕茂良,官刑部司务;吕愿良,官维扬司李。吕留良,父卒后四月,方由侧室杨孺人所生,诞生之后,其母无力照料,将他交给三兄愿良夫妇抚育。吕留良三岁时,三嫂又病故,过继给堂伯父吕元启。不久之后嗣父、嗣母,以及本生母相继过世,故而吕留良的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不间断的服丧之中度过,“计自始生至十五岁未尝脱衰经”,不可不谓孤苦凄凉。<sup>[2]163-72</sup>当时的吕家,还是一个深受明朝恩泽的宦宦世家、文化世家,故而少年失怙的吕留良,得以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,并表现得聪慧超群。

十六岁时,吕留良遭逢明亡清兴,不得不面临艰难的出处抉择。起先,吕留良散金结客、毁家纾难,曾与其友孙爽、侄吕宣忠等人参与过太湖义军的抗清斗争,失败之后吕宣忠被杀,吕留良于悲痛之中逃逸他乡。后来,因为害怕仇家陷害,羽翼未丰的吕留良于顺治十年被迫易名应试而成为清朝的诸生。其子吕葆中在《行略》中说:“癸巳始出就试,为邑诸生,每试辄冠军,声誉籍甚。”<sup>[3]864</sup>由此可知当时的吕留良,虽不汲汲于功名,却在举业上有着非凡的才能,之后从事时文评选而成名也就不足为怪了。直到康熙五年,吕留良方才决意摒弃科考,被革去秀才,这在当时也是惊人之举,吕葆中《行略》说:“一郡大骇,亲知莫不奔问旁皇。”<sup>[3]865</sup>此时写有著名的《耦耕

诗》,表达其隐居不出、终老乡野的志向,其二曰:“谁教失脚下渔矶,心迹年年处处违。雅集图中衣帽改,党人碑里姓名非。苟全始信谈何易,饿死今知事最微。醒便行吟埋亦可,无惭尺布裹头归。”<sup>[4]443</sup>然而清廷却并未轻易放过吕留良,康熙十七年(1678)有博学鸿儒之征,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,他誓死拒荐;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隐逸之征,吕留良闻知消息当即吐血满地,无奈只得在病榻之上削去头发,披上袈裟,后隐居于吴兴妙山的风雨庵。<sup>[2]255-256</sup>即便如此,生前节义之间的挣扎结束了,死后却依旧难以免除是非。雍正十年,吕留良被剖棺戮尸,甚至连累子孙以及门人,或被戮尸,或被斩首,或被流徙为奴,罹难之惨烈,可谓清代文字狱之首。<sup>[2]378、397</sup>

由此可知,吕留良原本就是一个前明的遗少,然而为了其家族在清廷之下的生存,不得不在科考等方面有所让步。但是,与一涉科考便有心功名的变节遗民不同,吕留良的遗民情结是自始至终萦绕在胸的,故而一旦时机较为成熟,便又退守其遗民本色,且颇为坚决,毫不假借。以上之所以略述吕留良之生平,及其遗民心态之曲折,是因为与其学术思想之发展息息相关。

## 二

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子学,然与当时其他理学家不同,不以语录、讲章行世,而以时文评选著称,而《四书讲义》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相关义理的精华。<sup>①</sup>

时文,也即八股文、四书文,又称制义、时艺等。明、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,就是以八股文考试学子,以《四书》中的句子命题而代圣贤立言,又以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准,故而对于《四书》以及朱子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,成为士人科举乃至人生成败的关键。其实学风、士风端

<sup>①</sup>吕留良时文评选的著作主要有《天盖楼偶评》《天盖楼制艺合刻》《十二科小题观略》《十二课程墨观略》《唐荆川先生传稿》《归振川先生全稿》《陈大樽先生全稿》《钱起士先生全稿》《黄陶庵先生全稿》《黄葵阳先生全稿》《江西五家稿》《质亡集》等。后由吕留良的弟子,将时文选本中的吕氏评语摘出,并以《四书》的顺序加以重组,重要的版本有周在延编《天盖楼四书语录》、陈鑑编《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》、车鼎丰编《吕子评语》,其中流传最广的是《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》。

正的话,八股取士也能求得真才实学者,但事实上,生逢明清之际的乱世,学风、士风皆难免乖戾,这在结社、选文上表现尤其突出。吕留良《东皋遗选序》说:

自万历中,卿大夫以门户声气为事,天下化之。士争为社,而以复社为东林之宗子,咸以其社属焉。自江淮迄于浙,一大渊藪也。……凡社必选刻文字,以为罔媒。自周钟、张溥、吴应箕、杨廷枢、钱禧、周立勋、陈子龙、徐孚远之属,皆以选文行天下。选与社例相为表里。<sup>[5]160</sup>

当时的复社、应社、几社,以及吕留良之兄吕愿良集合浙省十余郡文士所举的澄社,吕留良之友孙爽、侄吕宣忠等所举的征书社,也都有选文之举。而举征书社之时,年仅十三岁的吕留良就曾参与,且能“千言立就,芒彩四射”<sup>[3]864</sup>。

吕留良本人曾两度从事时文评选,并成为与艾南英、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名家,“今者鹿洞之遗书同南阳之评本,无不家户肆”<sup>[3]871</sup>。王应奎《柳南续笔》说:“本朝时文选家,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,远而且久。”<sup>[6]163</sup>其前期的时文评选时间较短,约为顺治十二年(1655)至十八年。抗清失败后,吕留良不知当如何出处,如何治生,于是应他人之邀而从事选文,他在《庚子程墨序》中说:“盖中无恒业,则日见无事,见无事则益块然无所用其心,心无所用,则其苦有甚于逼迫程限之役者,故欣然受之而不辞也。”<sup>[5]167</sup>由此来看,吕留良早期的时文评选并无明确目的,主要当是因为出处节义的困扰而内心苦闷彷徨,借以填补无所用之心。康熙五年(1666)被革去秀才之后,再度从事时文评选,直到康熙十二年。

为什么吕留良人到盛年,又再度以此为业呢?一方面,因为放弃诸生后治生之需要,当时的吕家生口繁盛,吕留良也不得不多方寻求治生之法。他在与多位友人的书信之中都曾提到选文之业所带来的财力,如在《与董方白书》中就说:“选文行世,非仆本怀,缘年来多费,赖此粗给,遂不能遽已。”<sup>[5]118</sup>另一方面,因为寄托议论、讲明义理之需要。其实就治生而言,当时的吕家毕竟还是大家族,当有众多的途径。故而吕留良钟情于选文,主要还是处于一种道义上的担当,也就是吕留良借时文而有所寄托的一面。吕留良自己在《与

施愚山书》中也说:“某踉伏荒滕,日趋夤固,偶于时艺,寄发狂言,如病者之呻吟,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,而赏音者以为有当于歌讴。”<sup>[5]116</sup>而在《答张菊人书》之中,则又详细解说了对于时文的态度,他说:

自来喜读宋人书,爬罗缦买,积有卷帙,又得同志吴孟举互相收拾,目前略备。……盖宋人之学,自有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,固不系乎诗也。又某喜论《四书章句》,因从时文中辨其是非离合,友人辄恣恧批点,人遂以某为宗宋诗、嗜时文,其实皆非本意也。<sup>[5]32</sup>

所谓喜好宋人之书、宋人之学,主要就是指朱子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而其次则涉及宋诗,故吕留良与吴之振(孟举)一起选刻了《宋诗钞》。吕留良认为朱子学是“直接三代”的真学问,故而通过时文来辨析朱子《四书》学说中的“是非离合”是其内在本意所在,至于外在形式之“时文”虽偶有讲求然并不太在意,故有人说他“嗜时文”、“时文选手”则“深耻而痛恨”<sup>[5]171</sup>。当时的吕留良,在家中开设了天盖楼书局,还到南京等地售书。自己刊刻并发行所评选的时文选本之后,摆脱了书商约定评选时限、篇幅之类的约束,也摆脱了评语体例上的限制,于是这些与众不同的优质时文选本开始风行起来,这就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,而是为了真正实现改革时文,并藉此弘扬朱子理学了。

那么作为一种道义上的担当,吕留良为什么要选择时文评选?其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三大原因。其一,吕留良对于晚明士人的结社、选文之风并不满意,认为是“以门户声气为事”,在他《东皋遗选序》中还说:“于是郡邑必有数社,每社又必有异同,细如丝发之不可理。磨牙吮血,至使兄弟姻戚不复相顾。”<sup>[5]160-161</sup>可见当时结社之多,社与社之间又因为评选时文中的利益冲突,故而产生了门户之争。士风之坏,除了结社本身,影响更大的还是时文评选行业。吕留良《答赵湛卿书》指出:

盖“选手”二字,某所深耻而痛恨者,不幸其行迹如之。尝谓近世人品文章,皆为选手所坏……若其苟且卑污,靡所不为,一副齷齪肺肠,不堪照看。目未识贵人,辄呼其字甫,若旧知深好;名未通一刺,已谱叙交契,攀援

线索，谓某某手授邮寄。士林廉耻之道，至此扫地尽矣。<sup>[5]71</sup>

吕留良一再强调虽为“选手”，却又以“选手”二字为耻，他本人亲自从事选业十多年，故深知其中的弊病。确实当时“选手”多有“齷齪肺肠”，以至于坏了“人品文章”，为了谋求暂时的利益，有许多“选手”全然不顾廉耻了。吕留良在其后期，之所以还在坚持时文评选，就是为了矫正此不良之风。

其二，吕留良虽不认同八股取士，但也不认为问题出在八股文上。当时的科举以八股文考试为重，导致了許多考生的枕边秘籍几乎只有时文评选的册子。不过究其病根，却并不在八股取士上头。吕留良《戊戌房书序》说：

自科目以八股取士，而人不知所读何书。探其数卷枕秘之籍，不过一科贵人之业。……然以为科目之弊专由八股，则又不然。

夫科目之弊，由其安于庸腐，而侥幸苟且之心生。文气日漓，人才日替，陈陈相因，无所救止。……且此数十万庸腐之儒者，其耳目无所开，其心思无所用，游谈妄议，武断乡曲以为蠹，如此而人心不坏，教化不坏，事业不损，衣食不耗，而无害于国家者，未之前闻。<sup>[5]172-173</sup>

应该说他看得还是很准的，科举的弊病，其根源还在于人心，人心容易“安于庸腐”，又在科举考试上抱有“侥幸苟且之心”。这些庸腐的儒者，不愿认真研读诸如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等经典，只将希望寄托在时文选本之上，方才导致了“文气日漓，人才日替”，导致了“游谈妄议，武断乡曲”，最后就是亡家、亡国。吕留良在《今集附旧序》中也说：

今日文字之坏，不在文字也，其坏在人心风俗。……今天下之视文字，殆不啻糠粃糟魄矣，岂皆学圣贤之学者与？……惟其视文字也轻，故明知其庸恶陋劣而不以为耻，曰：“吾以钓声利，弋身家之腴而已。”程子曰“洒扫应对，可以至圣人”，则知举业亦可以为伊傅、周召，然而闻此说也，则群哑哑而笑矣。<sup>[5]163-164</sup>

时文之作原本意在学孔孟、程朱等圣贤，代圣贤而立言，然而庸腐之儒者心怀功利，只将之视为

谋求进身之工具，故将之轻视，告知他们通过时文、举业可以成为伊尹、傅说或周公、召公，则群起而笑之。

于是吕留良在《戊戌房书序》中提出：“故愚以为欲兴科目，必重革庸腐之习而后可。”<sup>[5]172</sup>他之所以投入时文十多年，就是希望用好的时文，来驱逐恶的时文。在他看来，好的时文可以引导学子重回经典、重回成圣成贤之路。事实上，时文也未必没有好文字，比如吕留良就曾在康熙元年将自己所作时文三十篇，汇集为《惭书》一册，为此书作序的黄周星说：

昨得用晦制义，读之，乃不觉惊叹累日。夫仆所恨者，卑腐庸陋之帖括耳。若如用晦所作，雄奇瑰丽，诡势瑰声，拔地倚天，云垂海立。读者以为诗赋可，以为制策可，以为经史子集诸大家皆无不可。何物帖括，有此奇观，真咄咄怪事哉！使世间习此技者皆如用晦，则八股何必不日星丽而岳渎尊也？<sup>[3]498</sup>

因此，吕留良以时文名家的身份来做时文评选，也就能顺理成章了，更何况他还是真正懂得朱子《四书》学真精神的少数儒者之一，故而一旦进入此事业，便一发而不可收了。

其三，吕留良更为强调的是，通过好的讲章、时文来反对俗学、异学。什么是俗学、异学？吕留良《四书讲义》卷一说：“除却俗学、异学，即是大学之道。俗学者，今之讲章、时文也；异学者，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。”<sup>[7]3</sup>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、讲章都是俗学，主要由村师所授；还有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，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，将佛、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，他们所讲都是异学。吕留良在《程墨观略论文》之中专门谈了讲章之说的弊病所在：

程子曰：“今之学有三，而异端不与焉，一训诂，一文章，一儒者。”余按，今不特儒者绝于天下，即文章、训诂皆不可名学，独存者异端耳。……此余谓讲章之说息，孔孟之道不著也。腐烂陈陈，人心厌恶。良知家挟异端之术，窥群情之所欲流，起而抉其篱樊，聪明向上之徒，喜其立论之高，而自悔其旧说之陋，无不翕然归之。隆、万以后，遂以背攻朱注为事，而祸害有不忍言者。识者归咎于禅学，而不知致禅学者之为讲章也。<sup>[5]180-181</sup>

在吕留良看来,训诂、文章在明代的泛滥,其表现即为讲章之说,与时文一样,虽也讲程朱理学却多是“腐烂陈陈”的学问,故而“人心厌恶”,于是讲章便被阳明心学所占据,混入了禅学之流的异端之术,出现了大量攻击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讲章之学。对此问题,吕留良还在《答叶静远书》中有进一步的说明:

病在小时上学,即为村师所误。授以鄙悖之讲章,则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;导以猥陋之时文,则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。凡所为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,初未有知,亦未尝下火煨水磨之功,即曰“予既已知之矣”,老死不悟所学之非。鼠入牛角,蝇投纸窗,其自视章句传注文字之道,原无意味也。已而闻外间有所谓讲学者,其说颇与向所闻者不类,大旨多追寻向上,直指本心,恍疑此为圣学之真传;而向所闻者果支离胶固而无用,则尽弃其学而学焉。一入其中,益厌薄章句传注文字不足为,而别求新得之解。不知正、嘉以来,诸讲学先生亦正为村师之讲章、时文所误,不屑更于章句传注文字研究辨析,乃揣撰一副谬妄浅陋之说,以为得之,不觉其自堕于邪异耳。故从来俗学与异学,无不恶章句传注文字者,而村师与讲学先生其不能精通经义亦一也。<sup>[5]129</sup>

俗学与异学,导致的是士人“以为章句、传注之说不过如此”,“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”,因此就不会去对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“下火煨水磨之功”,却还自以为已经有所得了,而更严重的则是以邪异之说来“别求新得之解”,结果离开正道越来越远。所以,吕留良要用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、传注,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,以及八股文之中的文字法度,以端正被俗学、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、时文风气。

上述三点,其实有着共同的指向,也就是世道人心,而人心之坏其根源,本在功利之企求,次在阳明心学、禅学之异端,故想要疗治士人之心也只有以时文为药,通过时文来重新讲明程朱之学、圣贤之道。署名为吴尔尧《天盖楼大题偶评序》中曾引吕留良的话:

读书未必能穷理,然而望穷理必于读书也。秀才未必能读书,然而望读书必于秀才

也。识字未必能秀才,然而望秀才必于识字也……舍此识字秀才读书者而安望耶?<sup>①</sup>

读书之人未必能从事程朱理学去格物穷理,但是想要寻找传承程朱理学之人却还是在读书人当中;秀才们也不见得真正读书,但想要寻找读书之人也还是在那些识字的秀才当中;进而言之,儒门正学的弘扬,也就只能从那些秀才们最有可能接触的书籍入手。吕葆中的《行略》也引过吕留良类似的话:“道之不明也久矣!今欲使斯道复明,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,无可与言者;而舍四子书之外,亦无可讲之学。”<sup>[3]870</sup>吕葆中还说其父“晚年点勘八股文字,精详反复,穷极根抵,每发前人之所未及,乐不为疲也”。可见在吕留良看来,改变士风、学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士人所离不了的《四书》、时文,以最为优秀的四书文之评选来作引导。

吕留良以时文反时文,因而著成一系列著名的时文选本,再由后人汇集为《四书讲义》等书,影响了一个时代。这一点钱穆先生在《吕晚村学述》中分析得最为透彻:“晚村于当时讲章家言,虽极致其鄙薄之意,而其自所致力,则终不出讲章一途。在彼之意,实欲拔赵帜,立汉帜,借讲章之途径,正儒学之趋向。”<sup>[8]213</sup>显然挽救世道人心,是其进行时文评选的深层用心所在。

当然,对于时文的作用,吕留良也有矛盾的心态,他在《与吴玉章第二书》中说:“但取圣贤之书,虚心玩味,先通其文义而渐求其理之所归,不必作时文。有所见即作古文论说亦得,或作讲义、或作书牍亦得。”<sup>[5]136</sup>这就是说,读书之后有所心得,与其写八股时文,不如写古文或讲义、书牍,他最认同的还是直接去读圣贤之书,作时文则不见得真有必要。这种矛盾心理,置于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和吕留良的文化认同中来看,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### 三

关于吕留良是否笃信朱子学,学界多有不同说法,其中影响颇大的则是全祖望在《小山堂祁氏遗书记》之中的说法:

<sup>①</sup>据卞僧慧先生的考证,此序实出吕留良本人之手。吴尔尧:《天盖楼大题偶评序》,载《吕留良年谱长编》,第203-204页。

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，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。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，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与。交乃既毕，用晦之使者，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《礼记集说》、王偁《东都事略》以去，则用晦所授意也。南雷大怒，绝其通门之籍，用晦亦遂反而操戈，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，力攻新建。<sup>[9]1074</sup>

全祖望的说法影响极大，比如章太炎《书吕用晦事》就说吕氏之学“本非朱学”，“以太冲主王学，欲借朱学与竞”<sup>[10]317</sup>。且不说吕留良是否有与黄宗羲竞争之意，但看其学术发展脉络，即可知其于朱子学必然积学深久。吕留良曾在《复王山史书》中说：

某荒村腐子也，平生无所师承，惟幼读经书，即笃信朱子细注，因朱子之注，而信程、张诸儒，因朱子、程、张而信孔、孟。”<sup>[5]69-70</sup>

吕留良自幼熟读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并认为由朱子之注可至二程、张载等宋儒之学，再至孔子、孟子之学，笃信朱子学为儒门正宗。再者，吕留良少年时代就钻研时文，而时文成败在于是否对《四书》之精义、实学有所精通，由此亦可知其必然精通朱子学。当然并不是说受王学影响，比如康熙初年，黄宗羲到吕留良家处馆时，他在与张履祥的信中就说“平生言距阳明，却正坐阳明之病”<sup>[5]2</sup>，也就是说吕留良也曾受过王学影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朱子学的立场，正因为当时还有一点朱、王调和心态，故与黄宗羲有所交往，然在康熙五年之后则渐渐放弃调和，转而推尊朱子学，又与早就转向朱子学的张履祥多方联系。康熙八年，张履祥到吕留良家处馆之后，吕留良的朱子学自然也就更为精进了。

在明清之际，因为注意到王学末流的弊病，转而推尊朱子学的学者极多，著名的如顾宪成与高攀龙，然而吕留良与他们不同，其主张也并非简单的“尊朱辟王”，究其本意则有三个特点。

第一，此非门户之争。吕留良在与高攀龙之侄高汇旃的书信中说：“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。正、嘉以来，邪说横流，生心害政，至于陆沉，此生民祸乱之原，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。”<sup>[5]9</sup>正德、嘉靖以来，各种邪说流行，最后影响人心、政事以至于明亡，在吕留良看来想要明道，也就必须力辟王学以及其他各种邪说，这只是为了学术、

人心，而非程朱、陆王之间的门户之见。所以他一直强调，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、孟正学，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，都需要辟之而后已，除了王学，还有佛学，还有永康学派陈亮（龙川）的事功之学。《四书讲义》中结合朱子的集注，对这些异学的批判极多，比如卷十六、三十四说：

此便是学术义利之分，不可不辨，亦即朱子与龙川力辟之旨也。<sup>[7]376</sup>

此永康事功之害，朱子辟之与金溪同。<sup>[7]764</sup>当然吕留良之所以认同朱子之辟陈亮，不只是因为朱子认为其为异学，而在于认同朱子的义利之辨本身，也即重义轻利。至于为什么必须“尊朱”，《四书讲义》卷二十、三十九说：

圣人新民之极，三代后惟朱子得之耳。观其与陈、吕辩论可见。<sup>[7]27</sup>

惟孔子能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惟孟子能述孔子，惟程、朱能述孔、孟，其道同也。<sup>[7]21-222</sup>

在吕留良看来，或是从朱子学术之广大精微来看，或是从朱子与陈亮、吕祖谦等南宋诸子的论辩来看，唯有朱子才是真正传承儒门正学者，传承了孔、孟，乃至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以来的道统谱系，故而必须折衷于程、朱。

第二，不愿有所调停。吕留良《与施愚山书》说：“论人，则可节取恕收，在阳明不无足法之善；论道，必须直穷到底，不容包罗和会。一着含糊，即是自见不的，无所用争，亦无所用调停也。”<sup>[5]16</sup>清初之时，诸如黄宗羲等人主张朱、王调停，其背后则是为王学张本。吕留良虽然也认为就个人事功而言，王阳明“不无足法之善”，但就学术而言，则将论人与论学分开，在学术上当求唯一性，故而不可调停。《四书讲义》卷十七说：

世教衰，人心坏，只是一个没是非，其害最大。看得孔孟、老佛、程朱、陆王都一般并存，全不干我事，善善恶恶之心，至此斩绝，正为他不尚德，无君子之志也。才欲为君子，知尚德，定须讨个分明，如何含糊和会得去。<sup>[7]391-392</sup>

吕留良极力反对晚明以来的三教合一，反对晚明以来孔孟、老佛以及程朱、陆王都可以并存不悖等说法，他认为为了世教、人心起见，就必须要把学术一一分辨，不可含糊和会，这是他与东林

学派等倡导朱子学者的很大一个不同。

第三,认为儒门正学唯由朱子学而上方可讲求。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,上文也已提及,但有必要专门就吕留良所理解的朱子学之真再作阐明。吕留良一再强调,宋末以来的朱子学者“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”,出处、辞受先儒不曾讲究,但是儒门“下手入德”的关键。吕留良在《复高汇旃书》之中说:

从来尊信朱子者,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,而近世阐提陆说者,其权诈又出金溪之上。金溪之谬,得朱子之辞辟,是非已定,特后人未之读而思耳。若姚江良知之言,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余,乘吾道无人,任其惑乱……而所谓朱子之徒,如仲平、幼清,辱身枉己,而犹哆然以道自任,天下不以为非。此义不明,使德祐以迄洪武,其间诸儒,失足不少。

故姚江之罪,烈于金溪,而紫阳之学,自吴、许以下已失其传,不足为法。今日辟邪,当先正姚江之非,而欲正姚江之非,当真得紫阳之是。《论语》“富与贵”章,先儒谓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。今示学者,似当从出处去就、辞受交接处,画定界限,札定脚跟,而后讲致知、主敬工夫,乃足破良知之黠术,穷陆派之狐禅。盖缘德祐以后,天地一变,亘古所未经,先儒不曾讲究到此,时中之义,别须严辨,方好下手入德耳。<sup>[5]10-11</sup>

吕留良指出,宋代陆九渊(金溪)流于佛禅而非儒门正学,经过朱子的严词辟陆,是非得以分辨,到了晚明的王阳明(姚江)则更流于佛禅,且多权诈,故而危害比陆九渊更甚,所以要辟邪,当纠正王学之非,讲明朱学之是。他还指出,自从宋末的德祐年间以来,诸如元代的吴澄(幼清)、许衡(平仲)等人,也是徒有尊朱之名,未得朱学之真,因为他们在元代的异族统治之下“辱身枉己”;而朱学之真则是“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”,也就是“当从出处去就、辞受交接处,画定界限,札定脚跟”。

在吕留良看来,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未曾讲究,因为他们未曾经历类似“德祐以后”天地亘古未有的大变局,而吕留良本人则经历明清鼎革,其变故是相似的,故对于节义有着深刻、真切的

认识。因此,他在《四书讲义》之中,也多有阐发先讲明出处、辞受而后方可讲明致知、主敬的观念,这方才是吕留良朱子学的根本所在、独特所在。钱穆先生也说:“讲理学正当从出处去就、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,札定脚跟,而岂理气心性之空言,所能辨诚伪、判是非。此一主张,乃畅发于其《四书讲义》中。亦可谓当晚村之世,惟如晚村,乃始得为善述朱学也。”<sup>[8]215①</sup>也可以这么认为,吕留良的朱子学,因为讲明出处、辞受等节义上的大问题,所以才成为真正结合其时代的朱子学,也就是真正承继了朱子,乃至孔、孟的儒家真精神。

吕留良的《四书讲义》,反复阐明的就是朱子学的真精神,就在于倡节义、反功利,这也就是所谓立身行己之道,也即出处、辞受之际札定脚跟。卷三十五、三十八之中说:

近来多讲朱子之学,于立身行己,未必得朱子之真。其忧有甚焉者,开堂说法,未开口时,先已不是,又何论其讲义、语录哉!故今日学人,当于立身行己上,定个根脚。<sup>[7]796</sup>

能够做到大圣大贤的人,都是在出处、辞受上必有坚持,“经天纬地事业,都在这些子上做,毫厘差不得耳”<sup>[7]881-882</sup>。《四书讲义》卷七还说:“人必取舍明,而后可以言存养。吾见讲学宗师,谈心论性,诋诃古人。至其趋膻营利,丧身失脚,有不可对妻子者,吾不知其所讲者何事也。”<sup>[7]156</sup>吕留良讲《四书》、讲朱学,其出发点都是节义之道,故而对于晚明流行的空谈心性极为反对,自身节义无一可取,将心性说得高妙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;同样地,趋于功利而“丧身失脚”则更不足取。吕留良并不是说“谈心说性”之类存养工夫的讲求本身有错,而是说学问也有一个先后、大小之分,所以一再强调“取舍明”方可“言存养”。

①除了钱穆外,容肇祖、陈祖武等学者也注意到此文,他们认为吕留良讲朱学重视出处,这是其思想特点,但只将其联系于种族、民族气节,而未认为这是理学或儒学的真精神。容肇祖先生说:“种族的思想,他是很看重的,他要分夷夏,在满清入主的时候,他自然对于出处去就的节义,特别的看重了。”容肇祖:《吕留良及其思想》,载《辅仁学志》1936年5卷1期;陈祖武先生说:“他所谓‘先儒不曾讲到’的‘紫阳之是’,呼之欲出,那便是为他所一贯坚持和表彰的民族气节。……这样的朱学观,不仅前无古人,而且同清初陆陇其、张烈、熊赐履、李光地等御用理学家的尊朱辟王殊若霄壤,不可同日而语。”陈祖武:《清初学术思辨录》,第141页。

明晰吕留良诠释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核心理念之后,再来看吕留良所论夷夏之防等问题,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比如论“夷夏之防”,并非从种族出发,而是从节义之道出发,指出必须倡明节义,反对功利,这期间有着更具深度的儒家义理在。他在《四书讲义》卷十七“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章”说:

圣人此章,义旨甚大。君臣之义,域中第一事,人伦之至大。若此节一失,虽有勋业作为,无足以赎其罪者。若谓能救时成功,即可不论君臣之节,则是计功谋利,可不必正谊明道。开此方便法门,乱臣贼子接踵于后世,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,将万世君臣之祸,自圣人此章始矣。看“微管仲”句,一部《春秋》大义,尤有大于君臣之伦,为域中第一事者,故管仲可以不死耳。原是论节义之大小,不是重功名也。<sup>[7]401</sup>

前人对此章关注极多,大多断章取义而说吕留良在强调夷夏之防大于君臣之义,事实上其真正用意不仅于此。唯有钱穆先生指出吕留良讲春秋大义“为域中第一事者”,其立足点是在节义,“人惟节义之是守,而夷夏之防可立。晚村所以深斥永嘉而敬推朱子者,其意在是”<sup>[11]89</sup>。钱先生的诠释当是符合吕氏原意的。在吕留良看来,夷夏之防固然当守,此本不必多言,而需要讲明的则是如何守其防,唯有先明节义而已;至于“君臣之义”,固然是“人伦之至大”,君臣而后父子、夫妇,然而其中需要讲明的也就是节义。也就是说,真正需要讲明的只有节义之道,至于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选择,在于节义大小的分辨,而不在于功名大小的分辨。朱子还在辨析公子纠与小白谁大谁小以及“忘君事仇之义”,而吕留良则指出,不必论及公子纠、小白的是非,更不必论及功名大小,而要讲明管仲所作所为的节义大小。至于朱子等先儒为什么在此问题上会有纠结,吕留良分析道:“要之此一段道理,先儒不曾经历讲究,固难晓然耳!”从此可以看出吕留良对于《春秋》大义的思考,是与其经历明清鼎革之变,在节义上有新的体证有关的。吕留良还说:“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,甚精甚大……后世苟且失节之徒,反欲援此以求免,可谓不识死活矣。”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节义与功名之别,而功名大小则

要服从于节义大小,如不重节义而重功名,那就会被失节之徒误用了。

《四书讲义》之中所论君臣、封建与井田,也是在辨析节义与功利,卷六、三十八说:

人知父子是天性,不知君臣亦是天性,不是假合。……只缘三代以后,君臣都忘却了天字……直弄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。<sup>[7]142</sup>

父子之仁,君臣之义,并行于天地之间,皆天也,故皆仁也,知有父而不知有君,是知仁而不知义,则并其所为仁者,私心也,非仁也。<sup>[7]869</sup>

在吕留良看来,父子、君臣之间都有一个“义”在,而“义”则本于“天”,如不去讲求天理、节义则会生出种种私心来了。卷三十七说:

君臣以义合,合则为君臣,不合则可去,与朋友之伦同道,非父子兄弟比也。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,但志不同道不行,便可去,去即是君臣之礼,非君臣之变也。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,天下统于一君,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。嬴秦无道,创为尊君卑臣之礼,上下相隔悬绝,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,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,但以权法相制,而君子行义之道几亡矣。<sup>[7]831-832</sup>

因为君臣之义,来自天理,故而可以合则留,不合则去,这在周代的封建制之下比较容易实现,在郡县制、大一统之下则很难实现,所以说“有进退无去就”,更何况“尊君卑臣”以至于君臣上下悬绝,更无法实现士大夫的节义了。所以说,吕留良之所以重新辨析君臣关系,并倡导封建、井田,也就是因为倡导“君子行义之道”。卷三十四则说:

封建井田之废,势也,非理也;乱也,非治也。后世君相因循苟且,以养成其私利之心,故不能复返三代,孔孟、程朱之所以忧而必争者,正为此耳。虽终古必不能行,儒者不可不存此理,以望圣王之复作,今托身儒流,而自且以为迂,更复何望哉!<sup>[7]764-765</sup>

吕留良认为后世废封建、井田然后因循苟且,都是一种私利之心,然而就算终古必不能再行封建、井田,儒者也不可不支持立场,否则就是所谓曲学阿世,成了孔孟、程朱的罪人,儒者还应当有一点迂拙,而死守其节义,方能为世人留存一份希望。

吕留良的上述观念自然会引起统治者的警



惕，雍正帝驳斥吕留良，倒是下了一番功夫，且从节义入手，亦可谓抓住根本。他在上谕中说：

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，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！……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，乃始幡然易虑，忽号为明之遗民。千古悖逆反复之人，有如是之怪诞无耻，可嗤可鄙者乎？自是著邪书，立逆说，丧心病狂，肆无忌惮。其实不过卖文鬻书，营求声利。<sup>[12]556</sup>

雍正帝并不详论吕留良之阐发朱子学，而论其于明、清两朝之关系，论其最为关切的节义、功利。他认为吕留良在成为清朝诸生十多年后方才坚守明遗民之气节，实在难免“悖逆反复”之嫌，而时文评选则也有“营求声利”的一面。这两点确实也道出了吕留良心中隐痛，然而也只是指出其遗民心态的一个侧面而已，并不能反映其中的真实意义。至于《四书讲义》一书，雍正帝认为“毁之固未必能尽；即毁之而绝无留遗，天下后世更何从窥其底蕴，而辨诸道学之真伪乎”，故未禁毁，而是命大学士朱轼等编撰《驳吕留良四书讲义》一书，“逐条摘驳”。<sup>[12]590</sup>到了乾隆朝，《四书讲义》等吕留良的著述悉数被禁，其传播便转入地下。

#### 四

基于遗民情结，吕留良的以时文评选为载体的独特的朱子学思想，重在彰显中国儒学之中的节义之道，强调人为学，当重节义而非功名利禄，并以此来考量诸如吴澄、许衡等后世朱子学者，先问其出处、辞受之际的节义如何，带有朱子学式的道德严格主义色彩。其富有时代色彩的“义利之辨”，用心则在于端正士风、学风，挽救世道人心。吕留良与陆陇其最大的思想差异也在于此<sup>①</sup>，他的书之所以能风行一时也在于此。而在此理念之下，他的《四书讲义》对朱子的阐发在义理层面是统一的、精切的，且有诸多独到之处，无论是对王阳明、陈亮等人学术的排斥，还是对夷夏之辨以及君臣、封建、井田等问题的探析，都是从节义之道引申而发展朱子思想的。诚如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说：“书中悉就朱注发挥，然体会有得，多有比朱注更精更切者，时亦自出己意，不能尽合朱子。……自成吕氏之书，非一般尊朱不敢失尺寸者可以同语也。”<sup>[13]946</sup> 吕

留良于朱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发挥难能可贵，诸如节义之道等论述，虽不尽合于朱子然亦极有价值，绝非当时一般《四书》学者所能及。因此，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以及之后的《四书讲义》，在康熙、雍正乃至曾、吕文案之后，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。

受其直接影响者非陆陇其莫属，他在《松阳讲义》之中称引其当世学者唯有吕留良最多，钱穆先生也说：“稼书议论，颇有蹈袭晚村。”且就“蹈袭”还有小注：“稼书松阳讲义十二卷，其间称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处，迹尤显也。”<sup>[11]84-85</sup>此后，还有多种版本的《四书》类著作，也都引用了吕留良论《四书》，如王琰编撰的《四书绎注》五卷，钱穆先生在论及吕留良《四书讲义》影响时也有提及，但称其书名为《吕陆四书绎注》。该书于《四书》各章先摘录吕留良、陆陇其二人之评语，再附以己说，其序赞扬吕留良《四书》评语“于朱子之注《四书》有所发明，一时学者宗之”<sup>[14]477</sup>。李沛霖、李楨编撰的《四书朱子异同条辨》一书，对吕留良评价极高，称其为“杰出之士”<sup>[15]10</sup>。该书共四十卷，后又刊行书名为《四书诸儒辑要》的删减版，两个版本都曾一再梓行，影响极广，而又因其大量引用吕留良评语而曾遭禁毁。陕甘总督李侍尧、四川总督文授分别奏缴该书，都说“内有吕留良讲义七百零二条”<sup>[16]16, 263</sup>。还有康熙三十六年刊行的、张庸德增补的《四书尊注会意解》，因为“内多吕留良说”而被禁毁<sup>[17]1096</sup>，这些事例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吕留良时文评选的思想力量。

至于清初学者对吕留良的评价，则可举隐居深山的王夫之，在其《搔首问》一书中说：“近有崇德人吕留良，字用晦，极诋陆王之学，以卫朱子之教，是已。”<sup>[18]646</sup> 王夫之不完全认同吕留良，然而也极为关注其“尊朱辟王”之影响。戴名世《九科大题文序》说：“吾读吕氏之书，而叹其维挽风气，力砥狂澜，其功有不可没也。……而二十余年以来，家诵程、朱之书，人知伪体之辨，实自吕氏倡之。”<sup>[19]102</sup> 王弘撰《山志》也说：“近时崇正学、尊先儒，有功于世道人心者，吕晚村也。”<sup>[20]266</sup> 可见当时吕留良的书风行海内，且真正起到了推尊

<sup>①</sup>陆陇其自己也说：“所不能尽合于先生者，程明道有云：‘一命之士，苟存心于利物，于人必有所济。’斯言耿耿，横于胸中，遂与先生出处殊途。”陆陇其：《祭吕晚村先生文》，《三鱼堂文集》卷十二，参见卞僧慧《吕留良年谱长编》，第305页。

朱子学、维挽风气的作用。到了晚清，文网稍宽，吕留良《四书讲义》等书又再度风行起来，如曾国藩在同治四年（1865）七月的家书中就说时文当读吕晚村<sup>[21]1024</sup>；张謇《吕晚村墨迹跋》也说：“蹇十四许时，读晚村批评之制艺，义本朱子，绳尺极严，不少假贷，缘此于制举业稍睹正轨。”<sup>[2]455</sup>由此可见，无论是八股文之写作，或是推尊朱子

学，吕留良的影响都是覆盖有清一代的。

对吕留良普遍给予极高评价的背后深意在于：节义之道自始至终都是清代士人心中隐藏的大问题。正因为吕留良将节义之道与遗民心态融铸起来，提升到突出的高度，其推尊朱子学才有了时代意义，而他的时文评选也才能够在清初文章学中赢得富有光彩的独特地位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张天杰,肖永明.从张履祥、吕留良到陆陇其——清初“尊朱辟王”思潮中一条主线[J].中国哲学史,2010,(2).
- [2]卞僧慧.吕留良年谱长编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3.
- [3]吕留良.吕留良全集(第二册)[M].俞国林,编.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
- [4]吕留良.吕留良全集(第三册)[M].俞国林,编.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
- [5]吕留良.吕留良全集(第一册)[M].俞国林,编.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
- [6]王应奎.柳南续笔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7]吕留良.四书讲义[M].俞国林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2017.
- [8]钱穆.吕晚村学述[M]//钱穆.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(第八册).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1.
- [9]全祖望.全祖望集汇校集注[M].朱铸禹,汇校集注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.
- [10]章太炎.章太炎全集(第五册)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.
- [11]钱穆.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.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1.
- [12]清代文字狱档(第九辑)[M]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7.
- [13]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(经部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3.
- [14]王燏.四书绎注[M]//四库禁毁书丛刊(经部第8册).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00.
- [15]李沛霖,李楨.四书朱子异同条辨[M]//四库禁毁书丛刊(经部第2、3册).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00.
- [16]雷梦辰.清代各省禁书汇考[M].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9.
- [17]张书才.纂修四库全书档案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.
- [18]王夫之.搔首问[M]//王夫之.船山全书(第十二册).长沙:岳麓书社,1996.
- [19]戴名世.戴名世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20]王弘撰.山志·二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9.
- [21]曾国藩.曾国藩全集·家书二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85.

[责任编辑:晨曦]